



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

作者：弗弘索·鄔達

序：弘索·鄔達及巴姬·黛芭





2011年11月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

Avenue Michel-Ange 11

1000 Brussels

Belgium

電郵：info@rosalux-europa.info

中文翻譯：

李俊妮、周思中

編輯：

Renato Sabbadini

圖片：

Oswaldo Guayasamin 的作品《El abrazo》(封面)、《Los amantes》(封底)

版權：厄瓜多爾，基多，Fundación Guayasamín

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

作者：弗弘索·鄔達

序：弗弘索·鄔達及巴姬·黛芭

本文由弗弘索·鄔達撰寫，於 2011 年 4 月 28- 29 日於羅莎盧森堡基金會主辦的「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會議上由法蘭仙爾·萬斯坎（Francine Mestrum）讀出，並於會議後作出修改。此文亦作為一份提交予基多 IAEN（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Nacionales）和厄瓜多爾外交部的文件的基礎。

目錄

目錄.....	4
序.....	5
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	7
1. 前言.....	7
2. 為何把「公共財產」和「人類共善」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	7
3. 多面向的危機.....	8
3.1 不同的危機.....	9
3.1.1 金融及經濟危機.....	9
3.1.2 糧食危機.....	10
3.1.3 能源危機.....	10
3.1.4 氣候危機.....	12
3.2 有何解決方法？.....	13
3.2.1 改變行動者，而非制度.....	13
3.2.2 建立監管制度.....	13
3.2.3 為現行模式尋找替代方案.....	14
4. 新範式.....	15
4.1 重新定義與大自然的關係：由剝削到崇敬作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	16
4.2 重新強調生活必需的生產，強調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	19
4.3 重整集體生活：社會關係及制度的普遍民主化.....	21
4.4 確立相互文化主義，共建普世共善.....	22
5. 以「人類共善」作為全球目標.....	23
6. 邁向關於人類共善的共同宣言.....	25
7. 參考書目.....	26

序

危機一個接一個，我們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

巴姬·黛芭（Birgit Daiber）及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

我們真的必須以發展之名而破壞地球？經濟增長是否必然犧牲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挽救經濟需要以青年失業為代價？連串的危機、對新自由主義偏執的追求、普遍存在的三公義：凡此種種皆都對人類提出根本的拷問。在世界各地，憤懣持續加劇。被壓迫者的呼喊在大地之母的哽咽間迴盪。

解決危機的措施持續失效：2009年，於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及其後的會議沒法產生具約束力的決定。聯合國於金融及經濟危機的會議裡，管制破壞性金融投機資本的建議無人問津。

採取行動的時刻到來了，我們要為此開發新的想法。然而，修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障礙、宣揚綠色資本主義、監管金融市場、以發放援助的方式對抗貧困、制定越來越軍事化的安全系統以及懲處異見者，都只是調適現行制度的方法。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徹底的改變、另一個典範：換句話說，人類在地球生活一個根本的新方向。

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自食其果，它的毀滅性已然超過它所能創造的。我們務必要建立替代方案。大多數人生活於困惑之中。即使所有跡象都指向相反的結果，大量政客仍宣稱危機正逐步結束。被認為是進步的政黨變成危機的經理人。道德機構只自限於譴責濫權瀆職，卻沒有指出造成危機的原因又或譴責系統的邏輯。大範圍的經濟不穩，傾向令人固守他們努力所得來的，而非冒險作出改變。

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必須分析，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這不是一小撮專家的任務，而是我們所有人的任務。我們何去何從？要回答這問題，我們需要於行動和思考之間，建立雙向的辯證。

為此，我們來看看那些已經肩負起這項新挑戰的運動和計劃。歐洲的「憤怒者」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全球正義網絡、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無地農民及小農運動，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運動，皆表達了對新視角的探索。可作楷模的計劃如拉丁美洲的新區域發展銀行，即南方銀行（Banco del Sur）；以及拉美國家之間新的防止投機交易系統，即蘇克雷（the Sucre），印度保障小農收入的計劃（NREGA），東南亞地區改進社會保障的網絡（NTSP），還有其他在地的和區域性的計劃都顯示，儘管困難重重，但人們不會再浪費時間，並且有決心為了更好的未來而奮鬥。

這本小冊子提出了對危機的分析，還有對未來的展望。它考慮到數以百計預示人類共同利益的新典範：即人類共善，亦即具備無窮的文化表達，及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跟自然和諧共處——換句話說，就是呼籲一個值得致力投身的烏托邦。但如若這個不只停留在幻想，人類共善必

須被翻譯為實質的措辭。理論的導向必須指引我們日常的生活，但它們必須不斷更新而與人民的抗爭經驗同步。

此刻正是時候，提出一個可作為大家討論的思考基礎，指導我們的行動，凝聚大家的思考，也作為一個匯合不同運動的基礎，藉此改變人類於地球共同生活的座標。這是長遠的工作，但需要即時的決心。下一步將會是辨別行動者及制定策略——不是重塑已存在的，而是給新力量予那些正朝向人類共善的抗爭和計劃。而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布魯塞爾 / 基多，2011年11月30日

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

弗弘索·鄔達

1. 前言

由於社會越趨分裂、缺乏對公義的尊重、青年人失業、權力的濫用，以及破壞大自然，世界各地正陷於深刻的不安之中。新一浪的社會運動經已出現。社會論壇造就了他們的全球化。「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的集體社會意識正到處擴散。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其政治、文化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後果，正是社會失衡的根源。必需刻不容緩的尋找解決方案，而不只是改善舊有的模式，此刻正是提出新方向的時候了。反省並集結改變的力量，成為了當務之急。

意大利民眾對有關水源（公共財產的一種）的全民公投，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於 2011 年 4 月，在羅馬主辦了一個名為「從『公共財產』(Common Goods) 到『人類共善』(Common Good of Humanity)」的會議。會議的目的是希望對「公共財產」和「人類共善」，這兩個概念的連繫進行仔細的省察，以及融合不同改變社會的訴求及社會抗爭。

2. 為何把「公共財產」和「人類共善」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

目前，對「公共財產」的辯護乃是許多社會運動的首要事項。「公共財產」包括了諸如水和種子等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及不論在南半球或北半球，今天都正被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瓦解的「公共事業」。抗爭由許多影響公用事業和網絡的私有化浪潮（包括鐵路、電力、水、運輸、電訊、木材、河流和土地，以至到健康和教育）所組成。資本主義以前，在英國所謂的「公共財」¹已逐漸消亡而讓路給把生活各方面都商品化的經濟系統裡——此乃資本累積的必經之路，當下則由金融資本的主導所強調。公共土地被認為是荒廢的土地，與及其一切非資本主義的用途都被視為「沒有效用」(Michael Brie, 2011)。

要清楚的是，重新評定不論甚麼形式的「公共財產」（國有化或是以其他集體控制的形式），首要目的就是要突破以消滅大部份公營部門為目標，促進生產力發展以及私人項目發展的自由，並而長時期強調私人和個體的經濟邏輯。我們已經走到連生命本身都被商品化的地步。不透過國有化的操作拯救金融系統，反而還把它交給本來該要為危機製造負上責任的人手裡（事件中只有少數人被起訴），新的經濟邏輯由此牢牢緊握政治領域，這於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後尤其明顯。此等政策導致全國性的緊縮措施，普通市民為此付上代價，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政策得以維持。

對公共事業以及「公共財產」的守護，形成對這些政策的一些抗爭，如果抗爭並不可見於更廣闊的層面——對人類共善的抗爭，即地球及人類生命的抗爭——便很容易淪為無望的鬥爭。的確，甚至連世界銀行這些機構都會提出恢復一些特定的公共事業的建議。一些頂級生意人也會持相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看見私有化並不一定如預期中為他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¹公共財在十三世紀的英國乃指農民的公地，後來透過圈地運動使土地逐漸變為地主的私人產業——以圍欄築起來的土地，專門用作養羊。此舉激發眾多起義。

考慮到我們當前面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人類共善」這概念的進路看來容或過於理論化。儘管如此，它可以作為一個對應當代問題有用的工具，例如我們所面對的眾多危機，與及聚合一眾對抗破壞自然和社會制度的計劃及鬥爭。它涉及非常具體的現實，首先是團結，它不斷被競爭性及個人主義所削弱；還有利他主義、對大自然的尊重、溫柔，總的來說，人之所以為人的所有構成元素。

讓我們由危機與其各方面開始，嘗試勾勒其系統性。這讓我們得以觀照「公共財產」的問題，並從新觀點去看「共同利益」（Common Good）（與之相反的是個人利益（Individual Good）），結合成「人類共善」的視角。繼而，我們需重新認識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的範式，強調這進路在國內及國際經濟及社會政策的實踐面向，並以一個「人類共善普世宣言」的建議作結。

讓我們回到這些概念。第一，即是之前提及的「公共財產」。第二，就是我們現在所講，全人類（不分男女）一起分享的「共享利益」。在他的《政治學》，亞里士多德認為除非有些東西能夠互相分享——雖然他也認為這越少越好²——否則社會不可能存在。然而，我們無意從哲學層面探討這問題，倒是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探究——亦即去考察目前「人類共善」這觀念如何定位。事實上，這第三個概念由於其更普遍的性質，故有別於「公共財產」，它亦涉及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最根本的東西：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生活必需的生產、集體組織（政治），與及現實的詮釋、評估及表達（文化）。「公共財產」並不是人類遺產的問題，反之，它是一個關於人類福祉（of well-being）、過好活（*buen vivir*）的狀態，它是眾多參數結合起來管治人類在地球生活的結果。它也不是相對於「個人利益」，以及國家建構範式下所定義的「共同利益」

（common good），亦即「公共生活（*res publica*）」——雖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於1999年的報告都引進「普世共同利益」（Universal Common Goods）的概念。事實上，「人類共善」的概念包括了關於全人類在不同規模生產及再生產生命：總括來說，這關於生命的問題，及生命再生產自身的能力。

明顯地，「人類共善」的概念包括了如目前所理解的「公共財產」和「共同利益」的實際構想。如我們以當下的危機開始反思，理由簡單不過，因為這危機不僅糟塌「公共財產」和「共同利益」，被波及的還包括人類在地球的生存，以及大自然自我復原的能力，之所謂「人類共善」。因此，必需逼切地檢視這場危機的本質。事實上，正是累積的衝動由十三世紀開始破壞歐洲的「公共財產」。今天，為了工業化農業（尤其農作燃料）及採礦業，土地的掠奪正在南方大陸持續進行，這是「圈地運動」的一個新階段。同樣的邏輯，無論於資本主義的中心又或邊緣地區，都同樣損害著「人類共善」。現今盛行的是死亡邏輯，而不是生命邏輯。解決問題，我們必需究其本：亦即是說，我們今天必須重新定義構築人類共同善的條件。因此我們需要從描繪危機的根本性及系統性質開始，及其主要的元素。

3. 多方面的危機

全球超過9億的人生活於貧窮線之下，而數字還在持續上升（UNDP, 2010）；同時每24小時，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因饑餓及其衍生的後果而死亡；日復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及文化正逐漸消失，人類珍貴的遺產岌岌可危；男女的不平等繼續被形式及非形式的經濟系統所鞏固；氣候不斷變差；當這些都同時發生，就已不能單單說是偶合的金融危機，儘管危機早於

²佩特雷拉（Riccardo Petrella）把飽受新自由主義及市場主導觀所挑戰的「公共財產」重新引介回進步思想中。（1998）。他的觀點建基於包括資產、文化、民主和土地的「新世界社會契約」。根據他的說法，這是一個關於原則的制定，以及建立適當的監管、制度及文化的問題。

2008年已經猛烈爆發。

3.1 不同的危機

3.1.1 金融及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事實上已遠超過它源頭的邊界，並且動搖了經濟的根基。失業、生活成本上升、最貧窮的人遭受社會排斥、中產階級的脆弱：全球受害者的數字正在增長。它不是突然發生的一些意外，也不是一些需被懲處的經濟人的濫權所造成的局面。我們正面對的是幾個世紀以來經濟歷史一直持續著的邏輯（Fernand Braudel, 1969, Immanuel Wallerstein, 2000, István Mészáros, 2008, Wim Dierckxsens, 2011）。從危機到監管、再由解除管制到危機一再發生，不斷發生的事件從來都受制於利潤率的壓力：當利潤率上升，經濟規管就會放寬；下降時，管制就會增加——但無論怎樣，情況永遠都是有利於被視為經濟增長引擎的資本累積。我們眼前所見的並不新鮮，這不是金融體制第一次發生的危機，而許多人也認為，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可是，多得新穎的信息和通訊技術，這幾十年來的金融泡沫，令問題的嚴重性變得難以估算。我們都知道，危機的爆發是始自美國次按的現象：即是，幾百萬人無力償還債務，但這些支不抵債的情況卻一度被偽裝成各重金融的衍生工具（Reinaldo A. Carcanholo and Mauricio de S. Sabadini, 2009, 57）。工業大國消費增長的速度超過收入的增幅（Joseph Stiglitz, 2010, 12）。可是，這個現象是個老問題，早在當虛擬經濟變得比實體經濟更為重要之時已經開始：換句話說，當金融資本開始比生產資本的利潤率更可觀的時候已開始（Jorge Beinstein, 2009, 29）。根據史蒂格里茲的說法（2010, 22），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肇因，就是尼克森總統（Nixon）於1972年決定撤銷金本位的政策。在國際經濟越來越互相依賴的情況下框架內，各種新的貨幣政策應聲而起（全球化）。

資本主義自早期便一直經歷金融危機。18世紀末是第一次，往後又不斷重演。而於之後的日子不斷再現，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的，要數1929/30那一次。隨著第二次大戰結束，及後又發生了許多區域性危機（墨西哥、阿根廷、亞洲及俄羅斯）。處於體制中心的國家，2008年新的世界金融危機觸發了一系列的特別措施：國家負債、信貸限制、緊縮政策等等。但南方國家也受到影響，例如中國的出口減少、對中南美洲、菲律賓等國家的匯款減少、以及油價上漲等等。此等國家雖然破產問題較不嚴重，他們有些甚至能從天然資源價格上升中獲益，並能累積重要的貨幣資源。然而，至少從能源而言，這造成了產油國及非產油國之間的不平衡。從糧食生產的問題而言，最受價格上漲打擊的人，就是消費力低者，當中尤以女性為甚。

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資本主義邏輯本身（Rémy Herrera and Paulo Nakatani, 2009, 39）。若然資本被認為是經濟的引擎，而資本累積又是發展的核心，那麼，利潤的最大化就是無可避免的。如果，經濟的金融化加速了盈利增長的幅度，而又如果投機炒賣加速了這個現象的話，整體的經濟組織模式就會朝著相同的方向走去。所以，這個邏輯的第一個特徵——亦即以盈利率的增長作為資本累積中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不受監管的資本市場無可避免會導至危機。正如聯合國一份委員會報告特別指出：「這是一個宏觀經濟的危機」（Joseph Stiglitz, 2010, 195）。

這與1930年代危機的背景類似，可是，最主要的分別在於當前的金融和貨幣失衡還結合了在糧食、能源和氣候等領域的危機：所有這一切，都是源於同一經濟邏輯。

3.1.2 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共有兩方面。第一個是不同短期因素的結合，另一個就是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前者可見諸 2007 年及 2008 年糧食價格突然飆升。當然這個現象可以歸咎於例如儲備萎縮等的幾個原因，但主要的成因乃是投機活動，而農作燃料生產更要負上部份責任（例如美國所生產以玉米為主要原料的乙醇）。所以，兩年內，小麥的價格在芝加哥股票交易市場有 100% 的升幅，玉米和乙醇則分別為 98% 及 80%。近年，由於預期食品生產會有快速而且豐厚的利潤，大量的投機資本皆從別處轉移至糧食生產上。結果，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的總幹事形容，於 2008 年及 2009 年，每年皆有超過 50 萬人跌入貧窮線之下，而貧窮人口的總數亦攀升至前所未有的 10 億人以上。這顯然是利潤邏輯、資本主義價值法則所造成的結果。

另一方面是結構性的問題。過去幾年，單一種植不斷擴張，導至農地集約——亦即是說，名副其實的逆向土地改革。以生產力低為名，世界各地的農民及家庭農業不斷被消滅。的確，以一時一刻的表現而言，單一種植的生產力比農民農業高出五百甚至一千倍。然而，必需注意兩項因素：第一，這種生產方式正帶來生態破壞。它砍伐森林、大量使用化肥而污染泥土、河流和海洋。於接下來的 50 - 75 年，我們將會為未來製造沙漠。第二，農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數以幾百萬計的農民因而遷徙到城市的貧民窟，加重婦女的工作，造成城市的危機，或者像在巴西一樣，增加內部移民的壓力，又或者遷移到其他國家去（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哥倫比亞、厄瓜多爾、菲律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西非）。

當其他工業生產資本的利潤相對下降，需要尋找新利潤來源的金融資本大增，農業現已與公用事業一樣，也成為資本新開發的領域（Samir Amin, 2004）。近來，我們又目擊了前所未有的現象，那就是：國家及私人資本對土地（尤其非洲）的掠奪，以用作糧食及農作燃料的生產。南韓的大宇集團（Daewoo）於非洲馬達加斯加，獲得一項面積達 1,200,000 公頃，為期 99 年的土地特許權。這引發該國嚴重的政治危機，協議最終要作修改。如利比亞、亞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家，於非洲的馬里及其他非洲小國正在進行相似的工作。至於歐洲及北美洲的礦業和農作能源的跨國企業，一如中國的國營及民營企業，亦嘗試找尋機會長時間開發數以百萬公頃的土地。

很少人會關注此等舉措對生態及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亦即所謂「外在成本」，不包括在市場計算之內的因素。這是資本主義邏輯，繼追求盈利率增長之後的第二個特徵。即使是核心國家，資本並不處理負面影響，後果往往都是當地的社會和個人承擔。這個向來就是資本的策略，無論對工人階級的命運，或在殖民統治下的邊緣國家的人民，資本都漠不關心；同理，對於大自然和在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是置若罔聞。正是由於這偶合性及結構性的雙重原因，糧食危機直接關係到資本主義邏輯之上。

3.1.3 能源危機

現在讓我們看看能源危機。天然資源正被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過度開發，但問題遠超過目下的石油價格暴升，它更是耗盡天然資源的幫兇之一。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接下來的 50 年，人類一定要改變能源的生產來源，從化石燃料轉移至其他的來源。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在近代「華盛頓共識」的年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標誌，象徵普遍放寬對經濟的限制），

非理性的能源使用、自然資源的浪費，變得越來越明顯。

個人在房屋及交通的消費等對能源貪婪的苛索，是這個模式最典型的例子。不止如此，放寬外貿正造成我們超過 60% 的商品越洋過海，這意味使用大量能源以及污染海洋。超過 22000 只 300 噸以上的船，每天在海上航行 (M. Ruiz de Elvira, 2010)。這規模的航運確保了可觀的商品交換，卻與邊陲生產原材料及農業商品的國家延續了不平等交易的原則。它也最大化了「比較優勢」：不管貨品需要走幾千公里路，都可確保貨品的價格便宜，這是因為工人被剝削得更嚴重，而且保護生態的法律都不存在又或是擔驚受怕。

石油、天然氣，以及鈾的產量於何時達到頂峰，當然眾說紛云，但我們都知道這些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日子亦不遠矣。在例如美國、英國、墨西哥及其他國家，這個過程已經開始。無可避免地，當這些資源被耗盡，其價格將上升，一切相關的社會及政治後果亦會惡化。對工業大國而言，對化石燃料及其他戰略性原材料的全球性控制便越來越重要，以至她們也毫不猶疑訴諸軍事力量來確保控制。美國的軍事基地地圖清楚的表明這點，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就證明其事。美國的軍費相當於所有全球其餘所有國家軍費總和的一半，她擔演著全球系統擔保人的角色便呼之欲出。沒有一個國家，例如英國、俄羅斯、中國在軍事上的支出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很清楚的，這不單是控制能源的來源，更加是確保整體經濟模式能夠得以存續。

農作燃料的問題必需在未來能源短缺的脈絡下檢視。由於需求持續增長，及石化燃料可預期的減少，找出解決方法乃相當急切。由於新的能源所需的技術發展在此刻還未足夠成熟（如太陽能 and 氫能），亦由於其他的解決方法（例如風能）雖很有意思，但卻只是微不足道或經濟上沒利可圖，農作燃料相比起就較吸引 (François Houtart, 2009)。它們通常被稱為生物燃料，因為基本的材料是生物，跟石化燃料的物質是無生命的有所不同。然而，農民運動特別針對這術語，事關大量生產農作能源實際上無異於摧毀自然和人類的生命。

農作燃料的解決方案曾一度獲得生態組織及運動的支持，但它卻被商界領袖所否定。大約 2000 年中期，後者的態度有所改變。經驗顯示，以巴西的蔗糖和美國的玉米生產乙醇所需要的技術證實是相對簡單的。情況跟以油棕、黃豆以及其他產油植物如白油桐（即麻瘋樹）生產農作柴油一樣。在巴西對乙醇需求的熱潮始於 1973 年的石油危機，乙醇使得巴西能減少入口昂貴的原油。在美國，由於其他國家的供應不可靠，所以就得減少對外來石油供應的倚賴。即使玉米產出的農作燃料較蔗糖為少，但這正好解釋為何政府大規模補貼乙醇的生產。

部份國家已經開始為整體能源使用立法規定一定比率的「綠色能源」。歐盟決定於 2020 年的比率需為 20%，其中 10% 需為綠色液態能源，亦即農作燃料。這個計劃意味幾百萬公頃的土地將會轉變成為農作燃料生產之用。實際上，以歐洲國家（美國亦然）的能源用量來說，根本沒有足夠的土地來滿足這需求。結果，到了 21 世紀的頭 10 年，她們便對南方大陸大量未開墾的土地虎視眈眈了。

農作燃料以單一種植的方式生產，亦即利用廣大面積的土地種植單一作物。如馬來西亞及印尼等許多例子所顯示，這意味著大規模砍伐森林。不用 20 年，這些國家 80% 的原始森林已為種植油棕樹及桉樹而被砍伐。生物多樣性消失了，對生態永續造成可怕的後果。種植這些作物不單要用大量的水，而且還需要施加大量的化學肥料及農藥。結果，被嚴重污染的地下水及河水流進大海。更甚是，小型土地擁有者被驅逐，大量土著被奪去祖先留下來的土地，造成無數社會衝突甚至暴力事件。如果按照現在的計劃一直至 2020 年，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

洲地區將會有以幾千萬公頃計的土地轉作農作燃料的單一種植——而全球近十億飢餓的人口大多來自這些地區。一切就為了增加微不足道的能源供應。

為推行這些計劃，一方面，我們會見到金融和投機資金進入這些行業；另一方面，在非洲尤其明顯，新一輪土地掠奪。位於北非的幾內亞比索，為了生產農作柴油，有計劃投入 500,000 公頃的土地——佔全國面積七份一——作種植白油桐之用。資本將會來自澳門的賭場（一如幾內亞比索，葡萄牙語於澳門流通，有助商業談判）。總理是負責此項目的銀行的主要股東。直到目前為止，農民的反抗與及對幾個部門（包括總理辦公室）的質疑令計劃暫時擱置，但這也只是暫時性。數十個相類似的項目正在例如坦桑尼亞、多哥、貝南、喀麥隆、剛果和肯亞等其他國家發生。

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歐洲理事會主席拉範龍佩（Herman Van Rompuy）和歐盟主席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於 2010 年 10 月達成了一項協議，以巴西的技術及歐洲的資金共同開發莫桑比克 4,800,000 公頃的甘蔗種植場（佔全國耕地七份之一），為歐洲供應乙醇。這計劃將確保歐洲實現其使用「綠色」能源的目標，卻不太關心對該國自然環境和人口的影響。

農作燃料的發展，體現著資本主義邏輯的特徵，忽視生態和社會的「外在成本」。它基於短期的計算，不把市場沒有承擔的成本計算在內，而這些成本就是由大自然、社會和個人來承擔。這些做法亦符合金融資本累積的法則和切身的利益。換句話說，它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計劃。

3.1.4 氣候危機

得力於聯合國各種關於氣候、生物多樣性以及冰川等等的會議，讓我們對氣候危機有充分的認識，而每天的資訊也越來越準確。在這裡，我們簡單總結一下目前的狀況。現行的發展模式是不斷排放溫室氣體（尤其二氧化碳），大自然裡吸收溫室氣體的碳滙（特別是森林和海洋）正不斷被摧毀。此外，通過大規模使用化工產品、單一種植，開採如石油、天然氣和礦物等自然資源，對生態系統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最終禍及氣候。

還有兩個方面是從來沒有被充分強調的。首先是「生態債務」。打從商貿資本主義開始以來，南方國家的天然資源被大肆開採，人力及生態資源均付出了嚴重的代價。此等掠奪行為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全由殖民地區來承擔。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的獨立並沒有改變這種剝削關係的邏輯。過去幾年，為了滿足北方國家的需求，掠奪土地以及過度開採礦材正在加速，造成生態災難以至社會衝突。因此，生態債務必須被算進南方國家的私人及公共外債。開採南方國家所得的物品的消費者，唯有承擔起這些生態和社會損害所造成的「外在」成本，才算是公平。實質上，消費者無異於締結了債項。另一個造成生態成本的，就是軍事活動。首先，戰爭是極其浪費的，而且轟炸、化學物品³的使用，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均對生態造成破壞。此外，軍備的生產包含使用消耗地球上的天然財富，而生產過程也排放溫室氣體。每年約 10,000 億的軍事支出，不可能不造成嚴重的生態系統破壞。

地球持續暖化，海面水平上升。我們生態的足印是如此巨大。根據一家專門從事這類研究的機構指出，地球大概在 2010 年 8 月的中旬已經耗盡了它自然地自我更新的能力。由於地球只有一個，這意味著此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此外，根據史特恩博士（Dr. Nicholas Stern）早

³越戰期間，美軍用橙劑破壞森林，打擊南越游擊隊根據地。此化學物品甚至於 40 年後的今天，依然造成巨大的傷害，數以千計初生嬰兒因有毒物質的累積而導致畸型。

在 2006 年給英國政府的報告所指，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本世紀的中葉，將會產生 150 至 200 億的氣候難民 (Nicholas Stern, 2006)。更多最新的統計甚至顯示更高的數目。

所有這些都顯露了財富集中的景觀，經濟及政治的決策者都身處其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指出，世上 20% 的人口消耗了地球 80% 的經濟資源。的確，在過去幾十年，數以百萬計人口已經達到一定的消費水平，但他們在全球 70 億人口當中只佔少數。那 20% 較富有的人的購買力，對資本的再造是非常有用，並且為金融衍生品提供了一個出口。其餘的人，就如蘇珊·喬治 (Susan George) 所說，是「多餘的數十億人」(S. George, 1999)。事實上，他們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沒有貢獻，亦缺乏購買能力。正如世界銀行也承認，貧富的差距不斷上升 (World Bank Report, 2006)⁴。正正由於這些動盪，這發展模式全球性地陷入危機。失控的都市化、國家陷入危機、以暴力解決衝突越見頻繁。諸如此類的表達，令有些人說，文明已出現危機。要從全球的動盪不安把自己解救過來，我們顯然需要解決的方法。對於問題的不同見解，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

3.2 有何解決方法？

3.2.1 改變行動者，而非制度

某些特別關注金融危機的人，贊成嚴斥並撤換那些直接要為造成經濟亂局負責的人。前國際貨幣基金總監米歇爾·康德蘇 (Michel Camdessus) 稱這些人為「偷雞賊」。這是資本主義制度裡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论，從所有危機中看到有利的徵象，藉此消除衰弱或腐敗的元素，從而在更健全的基礎上恢復積累。對他來說，要更換的是行動者而不是系統。

3.2.2 建立監管制度

第二個建議是監管規則。市場是公認不會自我監管的，需要有國家和國際機構承擔這任務。政府以及特定的國際機構應該介入監管。康德蘇 (Michel Camdessus) 在法國和天主教企業家談到市場的三隻手：市場的「無形之手」和國家監管的手，而慈善機構的介入，就是要保障那些無法從另外兩隻手得益的受害者。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乃其中一位此領域的理論家。在此意義下，「新凱恩斯主義」就被應用於當前的情況。為了令資本能夠再造，對系統的監管無異於挽救它，並因而重新定義國家及國際機構等的公共機構的角色。這是新自由主義似乎自 1970 年代起便忘記了的事 (Ernesto Molina Molina, 2010, 25)。

儘管如此，也有一些實質建議。例如，八大工業國集團 (G8) 建議對世界經濟體系作出一定程度的監管，但性質都失諸無關痛癢和暫時性。反之，聯合國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更前進的監管措施。例如，建議成立一個常設並與聯合國安理會看齊的聯合國全球經濟協調委員會，以及一個國際專家小組，恒常地監察全球經濟形勢。其他建議包括廢除避稅港和銀行保密制度，要求銀行加大儲備金額和對評級機構有更嚴格的管制。另外，還包括布雷頓森林機構一個意義深長的改革建議，與及建立區域貨幣，不再以美元作為世上唯一儲備貨幣的可能性。按委員會的報告，這一切皆著眼於推動「創新和強勁的增長」。這些都是反對目前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有力措施。可惜，聯合國於 2009 年 6 月的會議上只通過少數謹慎的措施，而且很快就被西方強國打發掉。

斯蒂格利茨委員會 (Stiglitz Commission) 在提出重整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監管時，也提及其他

⁴ 2010 年，正當金融危機沉重地打擊國內多數人口，法國首 500 名富豪的財富增加了 25%，由 1940 億躍升到 2410 億歐元 (Manila Bulletin, 8 July 2011)。

諸如氣候、能源和食物方面的危機，儘管它以「可持續」與否作判別的標準，但它對其目標的考慮還是未夠深入。到底為誰修補經濟系統？其發展模式會否只是一如既往地破壞環境和製造社會不公？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在貨幣及金融制度改革的建議，儘管很可能拯救我們脫離金融危機，甚至超越目前所有做過的，但這足以解決當前全球所面對的挑戰嗎？無論它擁有多少自我調節的方式，它依舊是在資本主義系統裡尋找解決方法。資本主義雖然備有所有適應新環境的手段，但其殘破不堪卻是長期性的。要過渡到另一個完全不同基礎的系統，當然需要監管，但相關的監管的前提，卻需要為新局面創造條件，而非讓系統小修小補以適應新處境。

3.2.3 為現行模式尋找替代方案

第三種進路在此便顯得必需：它需拷問發展模式本身。當前所變得嚴峻的危機都是同一根本邏輯的後果：一）它所設想的發展完全妄顧環境和社會破壞等「外在成本」；二）它假設地球有無窮盡的資源；三）它視交換價值高於使用價值；四）它把經濟等同於盈利率及資本累積，從而造成莫大的不平等。這模式處於全球財富驚人發展的源頭，但卻由於其為大自然帶來的破壞及為社會帶來的不平等，經已完成歷史任務。它無法再自我複製，或以當代的語彙來說，它不可持續。戴亞克辛斯（Wim Dierckxsens）評論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不但傾向剝奪世上大多數人的生活，它甚至毀滅環繞我們的自然生態（2011）。

阿根廷經濟學家拜恩斯坦（Jorge Beinstein）指出，資本主義在過去的四十年由於生產部門下降已經走向全球性的衰落，它只不過是以人為的金融業發展以及龐大的軍費作為掩飾（J.Beinstein, 2009, 13）。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只講監管，我們是要另尋出路。這不應只是純粹理論反思的結果，反之，它必須通往實質的長中短期政策。

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現今經由全球化，及其於社會、政治和文化各個層面而大行其道，定義著集體生活的基本範式，若提出另類方案，也就即是要檢視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的根本範式。此範式由四個元素所組成，之所謂根本，是因為從遠古至現在，它們都是所有社會組成的重要部分。讓我們扼要說明一下：一）跟自然的關係；二）物質、文化、精神上等基本生活元素的生產；三）社會及政治的集體組織；及四）對現實的分析及文化建構中行動者的自我參與。這是每個社會都要達至的目標。

目前，指導當代世界構建的範式，可以總括為：現代性。這是歐洲社會及文化巨大變化的結果，也是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定義自身的範式。無可否認，它代表某一種進步（Bolivar Echevarria, 2001）。然而，現代性並非偶然衍生或無中生有的社會抽象概念，它關乎人類在地球的集體生活，其物質和社會基礎，及思想的生產模式。它確立了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同時在辯證過程中又體現了自身的矛盾。個人、人權、民主理念的解放，科學的進步及其技術應用皆是現代性的產物。然而，資本主義市場的霸權及其施加的法則，令這些進步淪為殘酷地持續了五個世紀的特權階級和殖民地關係。一些社會的抗爭，令一些從屬的群體在資本主義範式不變的前提下，嚐到了現代性的好處。在自身矛盾中，後者現在還反過來危害那四個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的基本要素。由於人類與自然之間已然存在了隔閡，現代性範式導致對自然的過度開採，亦即是對生命之源，大地母親的摧毀。它產生了以入侵生活所有面向為邏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政治領域裡，這種觀念造成雅各賓式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文化領域裡，肆無忌憚的個人主義成為倫理律令，還有人類無止境的進步概念、耗之不盡的地球資源，科學和技術能解決所有生活矛盾的幻想。現代性為包括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社會在內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基本座標。

這計劃的全球主導性於早期已經顯而易見。通過對所有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消滅、吸納或招降；通過不同殖民主義的南征北討、通過建立中心國家和邊緣地區之間不平等的交易，以及通過現在所謂的「全球化」，最終把增長和西化的概念凝聚一起，亦即是說，令資本的最新形式和霸權在全球擴散。

所謂的「後現代主義」，乃是對此模式的一種反動。然而，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發展的這種思維模式，其實也只限於在文化及政治的層面，揉合一些對現代性的模糊批判（M. Maffesoli, 1990）。他們認為，歷史的概念是個別行動者一時一刻的建構、拒絕承認各種結構的存在、否認以直線的因果關係定義各種系統的現實，以及對各種人文科學的明確拒斥，都令這股思潮彷彿成為了現代性的私生子，人亦因而變得去政治化。對新自由主義而言，後現代主義將自身轉化成一個輕省便利的意識形態。當資本主義還汲汲地為成為「世界系統」尋找新的物質基礎時，正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稱，拒絕承認系統的存在對提倡「華盛頓共識」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批判現代性當然非常重要，但需要取歷史和辯證的（權力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進路，並且渴望恢復歐洲歷史曾經曇花一現的解放本質。當然不能把現代性等同於資本主義，但抽空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也是不知所云的。

這是為什麼必須從哲學、物理、生物以及社會科學此等不同人類思潮的貢獻，重建一個貫徹的理論框架。重點是在創造新範式時，為每個新計劃在整體裡定位，因為這會讓看來個別的行動凝聚在一起，否則就會落得如實證主義般各元素之間互不相關。在國際政治上，這也是有效的。

如上述，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的基礎有四個方面：與自然的關係、基本經濟生活的生產、社會和政治上的集體組織，對現實的詮釋和象徵性表達。實現新範式的這四方面，便可稱為達至人類共善，亦即是我們一再重複，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因為歷史條件不斷變化，這目標需要持續追求的，而沒有一勞永逸的定義。然而，當前的危機需要基進的再思，需要直面問題的根源（István Mészáros, 2008, 86），而這意味一個與資本主義座標徹底不同的範式。根據不同的思想傳統，以及人民的集體生活經驗，人類共善的概念已經以不同的途徑表達，例如東方及美洲土著的哲學及宗教（the *Sumak Kawsay*, 或 *buen vivir*），還有馬克思（Karl Marx）主義傳統的普遍需求和能力的系統（A. Salamanca Serrano, 2011, p. 46 and S. Mercier-Jesa, 1982）。

4. 新範式

總括而言，現代性所表達的人類發展範式，就是假設地球資源耗之不盡，人類專享及控制無止境的物質與科學進步，並能越來越隨心所欲地得益於各式貨品及服務。這種生活模式建基於競爭性經濟（一種尤其雄性的特徵）的有效性，但這模式由於各種社會及生態矛盾，目前已走到盡頭。因而，我們需要基進的改變，以確保地球上的生命及長遠人文精神的延續性。

這新的範式，從根本上倡議一種人與人之間、性別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均衡的動態，同時與大自然融合一致，以促進生活及確保其再生產。這關乎到「過好活」，達至「人類共善」，亦即是重新開始尊重作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大地之母）的整體性。

在人類集體生活涉及的基本元素中建設及應用「人類共善」，需要按步就班：並非單純學術練習，而是在社會上能實現的；尤其以社會抗爭而言，思考與實踐經驗有著同等核心的地位。任何社會抗爭都對應著某種人類共善的失效，也是某種尋找解決方案的嘗試。當破壞性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地球上的各種經濟、社會及文化都顯出了其至高無上的力量時（雖然卻未能徹底消滅經濟、社會及文化等自身的特點），建基於自身社會特徵及歷史經驗的重建工作，便是男性和女性所有人一視同仁的責任。在重述生活必需的條件這問題上，不應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事實上，這範式並非表面上如此新穎——關於對人類在地球上命運的全盤觀點，從任何地球上前資本主義社會裡都可找到參考。許多宗教及哲學傳統（道教、儒家、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及回教等）均表達了這種全盤觀點，不少原住民的傳統宗教亦然。問題在於如何以當代的語言，為多元的現代社會重新發現恰當的觀點及具體的實踐。

4.1 重新定義與大自然的關係：由剝削到崇敬作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

現代文明對大自然的強力操控及高度都市化，已令人類忘記自己的生命歸根究底需要依賴大自然。氣候變化時而以非常殘暴的方法提醒我們這一點，這亦意味著不能將地大自然視為一個可隨意剝削的星球，亦不可將天然資源貶為可隨意買賣的商品；大自然是所有生命的源頭。在這意義下，大自然物理上及生物上的自我更新能力需要被尊重。而這亦意味著一個哲學性的激進改變：與大自然任何純功利主義式的關係都需要被質疑。資本主義視生態破壞為附屬的或無可避免——雖然也許發生得越少越好；更劣者，將生態破壞視為「外在成本」，由於這因素並不列在市場考慮，以至資本累積的計算之內。

有論者更進一步質疑以上觀點的人類中心主義假設，並提出「大自然之權利」等新概念，巴西神學家李安納度·波夫（Leonardo Boff）便曾在他的著作中捍衛這立場。正是在這基礎上，聯合國大會主席戴斯科托（Miguel D'Escoto），在2009年便於其離職演說中，提出「大地之母與人類普遍宣言」。同一屆聯合國大會亦於較早前由192個國家一致通過設立「大地之母日」，當中包含著人乃是大自然一部份這觀點，而這兩者應構成共生而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與會許多支持動議的發言，均認為把人視為世界的中心，無視其他物種，包括無視地球本身，不過是淺薄的人類中心主義——這觀點無疑帶來了負面而舉目皆見的生態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所謂地球的人類共善，卻只能以人類作為實踐的中介。只有人類的介入才能令地球自我更新——又或者只有人類的捕殺及破壞行為才能有效阻止地球自我復原。正是出於這緣故，地球的存亡，即生物多樣化，直接關係到人類共善。我們要是使用「大自然的權利」（Eduardo Gudynas, 2009）這說法，也只能以其第二種意思來掌握，因為只有人類才能違反或尊重那些權利，而無論地球又或者其他動物，都無法宣稱對其權利的尊重。

需要對生態系統破壞負全責的，正是人類。在這意義下，法學家安東尼奧·沙林萬卡（Antonio Salamanca）指出，根據法學觀念 *droit titulaire* or *droit vicair*e（即「附屬或次級法」），人類社群的行為必需照顧到能力有缺失者（例如動物、新生嬰兒、嚴重智障者等），因為他及牠生命的再生產要人類的中介。這觀點並非人類中心主義，而是令人類體認到他們自身的責任。如此擴潤這法學主體的概念，便能在不訴諸將地球及其元素個人化的基礎上，討論氣候公義的問題。與此同時，也不能忽略人與自然關係與階級關係的關連：不同階級與地球的關係並不一樣。這關乎到在資本主義邏輯中實踐出來的權力關係。

無論如何，問題的核心是地球必需具持續性——亦即有能力保持其生物多樣性——如此地球才能抵住人類各種行為而自我更新。我們亦可點綴大自然，以其豐富的植物資源來創造新的地景或花園，增添美感。地球是很慷慨的，即使存在著非可再生的元素，牠亦能造就各種生命

的生產及再生產。但上述所有都與剝削地球以獲得更高回報是徹底的兩碼事。

偉大的東方哲學傳統裡，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深刻關係是核心的思想特徵。印度教及佛教傳統中對所有生命的尊敬、關於輪迴的信念及其所表達的生命統一性及延續性，便說明了這一點。從猶太—基督教傳統中，我們亦發現人類由泥土所創造的信念，後來承繼了這意象的伊斯蘭教亦有同樣的元素。聖經將人呈現為大自然的守護者（創世紀 1, 26-28），即使聖經確認大自然的意義是要侍奉人類，但這顯然不包括對大自然的破壞。關於創世紀的神話，非洲及美洲許多文化裡的信念也相當接近。

對美洲的原住民，關於「大地之母」（Pacha Mama）的觀念處於核心位置。她因為是萬物之源而被人格化，有著各種人類的特徵。大自然的其他元素亦被視為有生命，有其個人特質，又或是巫術儀式的祭品。2011年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舉行的氣候高峰會，許多文本（包括會前的預備文件及會上不同團體及個人的發言）均超越了「大地之母」這意象的比喻性質，而賦與她有能聆聽，能回應及能被愛等人類生命特質——及由此，她也有屬於她的權利。最終的文件提出重新評估普及的智慧及先祖的知識，呼籲我們「確認大地之母為生命體，而我們與之有著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為補足及靈性的關係」。透過許多原住民的宇宙觀框架，文件強而有力地點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強調了這關係本身的母性（女性）特質。

當然，必需承認，面對資本主義的邏輯，即使偉大的東方哲學及遠古民族的傳統也難以抵擋其發展、高度都市化及無所用心的消費。不少都需要急速的轉化自己，甚至從文化領域中消失，例如亞洲的中國及越南，以及美洲大陸及非洲的許多原住民。新自由主義更是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強化這現象：擠身於這強勢文化的價值觀，已成為許多個人及群體的熱切期待。曾經在歐洲從屬階級及基督教身上發生的事情（畢竟基督教正是首個遭遇資本主義的宗教），而正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斷重複。意識型態污染無比真切。

可喜的是，傳統觀念現今又一次被召喚，作為歷史記憶、文化重建及身份確認的工具，能卓有成效地質疑資本主義邏輯。能夠援引眾多歷史文化及以其概念為社會重建作出貢獻，總是值得自豪的事，當然需要留意墮進原教旨主義的誘惑，固守過去而忽視當下有著無處著力的危險。

對於「大地之母」（Pacha Mama）、蓋楚瓦人（Quechua）的「過好活」（buen vivir），及愛瑪拉族（Aymara）的「共同好好過活」（living well together）的參考便屬於這個範疇。兩者均是許多原住民的原初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具體歷史處境，它們都代表著一種特定的宇宙觀，亦代表著尊敬大自然及共享集體生活的實踐。這點正可以啟發當前的思考及社會組織形式，以至為這符號注入新生命。然而，成功卻取決於是否能恰如其份地作出調整，如戴安娜·紀艾路加·蘇阿雷絲（Diana Quiroga Suarez）所言，「轉化提供機會讓最優秀的傳統和現代智慧互相結合，讓知識及技術跟隨著大自然的節奏」（D. Quiroga Suarez, 2009, 107）。

這當然不意味著質疑大自然與人類之間必要的和諧，亦不是草率地接受資本主義的看法：將發展純然等同於無邊無際的物質增長，並視剝削大自然乃是這種發展的必然副產品。這亦不排除某些哲學觀點需要翻新，例如那些忽略其他物種、或忽略大自然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觀點。我們也不應該低估或邊緣化一些能對人類提出良性批判的文化，尤其針對資本主義邏輯所帶來的剝削，或者消費主義模型裡瀰漫著的個人主義及其他由這模式衍生的行為。然而，必需承認不同的文化確然存在。若我們將所有必需實施的改變，純粹描述為符號式的思維，將符號呈現為現實，則有可能與分析性進路較強、較為傾向將物理及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置於特定範疇的文化發生矛盾。

目前，這兩類文化並存於世上。前者擁豐富的表達形式，長於反映符號的力量及理念（尤其是與大自然的關係）的重要性。這類文化通常有相當具體的元素，能輕易地傳譯為知識、行為及政策。但要地球上不同角落的都市文化吸收這些宇宙觀，卻並不容易。第二類文化則已被化約為徹底的操作理性，甚至純然的「超級結構」（或法國人類學家梅洛·哥德里亞（Maurice Godelier）所謂的「蛋糕上的櫻桃」），不斷強化資本主義邏輯，並為將其延伸得更無遠弗界作出貢獻；同時卻不能否認的是它造就了大規模的知識增長，有效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及政治問題。在對抗為人類及地球帶來各種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以單一文化的語言來提出自己的立場，就顯得相當不智。相反，這正是全方位實踐交互文化主義的適當時機。

上文已提及過卡爾·馬克思的貢獻。他認為資本主義啟動了大自然及人類之間人為的及機械性的分離。按資本累積過程的定義，新陳代謝的破裂就是人類為滿足其需要而與地球發生的物質轉換，最終導至非理性的實踐浪費及破壞（*Capital*, Vol. 1, 637-638, cited by Gian Delgado, 2011）。由是，馬克思認為，必需將物質能源的流動減少至對社會不同人都公平的程度，才能改變生活的質素。對他而言，只有社會主義能重新建立新陳代謝的平衡，及終止大自然的破壞。

提倡一種關於我們與大自然關係的新概念，將帶來許多實質的後果。我們將分為幾個類別而各舉一些例子，包括：必需的禁止及約束、正面的倡議，之後將討論對於國與國之間的政策意涵。

首先，我們必需取締所謂「天然資源」的私有產權，例如礦產、化石能源及森林。這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不可能像現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般任由個人及企業佔用——亦即是不能由漠視外在成本及只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利益所佔用。轉型的第一步，便是國家需要收回其天然資源的主權。當然，這並不必然保證能與大自然建立健康的關係：國有企業以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並不罕見，國家主權亦因而不必然意味一套尊敬（而非剝削）大自然的哲學。第二步將會是這部門的國際化，而必需的條件是相關制度（如聯合國及其屬下的機構）的實質民主：許多情況下，它們仍然受到強勢的政治經濟力量所影響。此外，所有人類行為的生態成本都必需列入經濟計算，以抗衡排除外在成本的功利主義邏輯——這就正是資本主義破壞大自然的原因之一。

其次，將再生產生命所必需的元素（例如食水及種子）商品化，亦需要禁止及約束。此等共享的物品不能受商品邏輯所支配，而需要以其他方式處理——當然亦不必然指由國家處理，而可以歸集體控制。具體而言，這原則包括阻止造成「明日沙漠」的單一種植，尤其是生畜飼料及農作燃料的種植。針對出口工業及農產品，按運輸距離而徵收的稅項，能同時減低能源使用及海洋污染。諸如此類的措施應多提出。

其他正面的措施包括，保護生物多樣化的保護區，應擴展到更大的範圍；推廣有機耕種及改善農民農業，長遠而言將會比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生產更有效率（O. de Schutter, 2011）。立法要求延長所有工業產品的「壽命」，將可能節省更多原始材料及能源，同時減少溫室氣體的生產（Wim Dierckxsens, 2011）。

最後，在國際政治的層面上，以金融機構為本的局面，與尊敬大自然的原則互相矛盾，需要展開多條抗爭的戰線。當全球的經濟都變得金融化的時候，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一眾地域性的銀行及私人銀行，全部財雄勢大。世界貿易組織所推廣的全球經濟自由化政策，由於沒有將外在成本計算在內，亦有著各種環境後果。這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在這方面需要承擔巨大的責任；具生態意識的國家之間的聯盟，有能力影響這組織的決策。

眾多國際公約的推廣是另一重要的面向。舉例而言，氣候（坎昆）、生物多樣化（波恩及名

古屋)、保護河流海洋及魚類、廢料(特別是核子廢料)等議題均有國際公約。推進新範式裡這方面的意識,將會是進步國家在國際上的集體力量的基礎,亦應成為其國家對外政策的一部份。

考慮到至目前為止的生態破壞,其對於氣候穩定性及地球自我復原能力的有害影響,核心的工作是以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來重新定義「人類共善」。這是集體良心的一個新因素,但與所有人都同等重視的程度仍相去甚遠。從例如中國這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的國家來看,外在成本到目前為止仍未得到多大的重視,可見。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真正的將這方面納入其規劃。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會把這方面納入為其政策的核心基礎。

4.2 重新強調生活必需的生產, 強調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

就經濟而言,範式的轉變取決於將使用價值列作優先,而非像資本主義的規劃般高舉交換價值。我們所指的使用價值,是當某件商品或服務對某人的生活有作用,而不是單純作為交換之物。市場經濟的特色,正是將交換價值列作首要:交換價值對作為最高階市場生產的資本主義來說,最高階的市場生產裡,就是其唯一的價值。無法轉換成商品貨物或者服務是沒價值的,因為它不能為資本累積帶來貢獻,而資本累積卻是整個經濟的目的及動力所在(M. Godelier, 1982)。據這種看法,使用價值是次要的,正如伊士雲·米沙勞斯所言,「如它能自我調節以符合交換價值的要求,它便能獲得存在的權利」(Mészáros 2008, 49)。只要有人願意付鈔,或廣告產生了人為的需要,又或在投機泡沫中產生的金融服務,任何物品即使完全沒有用途(例如大規模膨脹的軍費,或國際發展援助的大白象項目等)都可付諸生產。相反,強調使用價值將令市場照顧人類的需要。

事實上,所謂必需品乃是相對的概念,隨著歷史條件及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不變的原則是所有人都有權利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所需。這原則在《國際人權宣言》中有力地肯定了。然而,這不能在空中樓閣中達成,而需要恰當定義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環境。但相對性卻又不能等同不平等,例如有人能根據階級、性別和種族而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需要。不同層次的人類群體透過民主程序及能幹的機構(例如國家及國際的議會,代議議會等),才能定義所謂需要的滿足。這便可稱為建立一個「倫理經濟」,它遵守倫理要求而否定強勢的交換價值,而後者既是資本積累的來源,亦是經濟的終極目的——也因而成為唯一的價值。

要成就這種倫理經濟,必定要挑戰主要生產工具的私有化。這正是擁有資本財貨者坐享決策權的原因,亦是勞動者之所以受資本直接(透過薪水)及間接支配的基礎——所謂間接支配就是透過貨幣政策、國家債務、預算赤字、食品及能源價格的投機、公共服務私有化等。⁵工作條件日益惡劣(Jorge Beinstein, 2009, 21)及女性勞動——亦即生命再生產在所有方面的核心——的貶值,背後就是資本對生產過程的徹底控制。然而,以完全的國家控制作為對抗完全市場化的力量,如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所證明,並不是理想的方案。集體控制有由合作社到市民組織等許多不同的形式。

由此觀之,我們需要以另一完全不同的方法重新定義「經濟」。不應該再停留於為滿足生產工具的擁有者或金融資本而生產及累積利益,而是以確保地球上所有人類的物質、文化及靈性生活為目標的集體行為。建基於剝削而最大化利潤的國家或世界經濟是不能接受的;同樣道理,單單為地球上較高購買力的百分之二十人口而生產貨物及服務,純粹因為沒有足夠收入和生產附加價值而排斥了餘下百分之八十,也一樣不能接受。重新定義經濟因此就有一種根本

⁵有估計指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是非正式的,這讓組織工人變得更加困難。然而,目前已有不少新方法,例如隸屬於尼加拉瓜國家工人聯合會(FNT)的「自僱工人大聯盟」(CTCP-FNT),

改變的意義。將使用價值列作優先——而這也涉及生產力的發展——與及採納第一條基本原則，即對大自然的尊敬（就如我們馬上會論及的論點：普及的民主及交互文化主義。這並不否定為滿足新的使用價值而必需出現的交換，但前提是價值的在地獲得 / 使用不能失衡，與及不能忽略過程中產生的外在成本。

「增長」與「發展」是有分別的：這似乎被新古典及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所忘卻。一如天主教魯文大學的讓·菲臘普·比文斯（Jean-Philippe Peemans）教授所言，「累積的邏輯是唯一的發展邏輯」已經深嵌在我們的認識裡。但新的進路已經逐漸露頭角，而當中也存在著不同的模式。其中一種是援引拉丁美洲原住民的概念「過好活」（el buen vivir, 或 Sumak Kawsay）。這是一個遠為廣濶的觀念，不僅與將增長視為目標的觀念徹底相反，它更追求與大自然的和諧（Diana Quiroga, 2009, 105）。早在 1960 年代，對應當時已被認為是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羅馬俱樂部已提出零增長作為解決方法。在五十年代的蘇維埃，烏夫更·哈士齊（Wolfgang Harsch）已寫下了他極具原創性的《不談增長的共產主義》（*Communism Without Growth*）。

眼下，這觀點再次受到關注，而且激進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的沙基·拉陶治（Serge Latouche）早在 1990 年代已提出「去增長」的概念，並主要在歐洲的中產階級啟發了一連串減少消費及尊敬大自然的運動。誠然，這主題是積極的，而且解除「增長將解決所有問題」的迷思也是重要的，但潛藏其中的訊息其實頗為歐洲中心主義，適用範圍亦只包括有能力消費的階級。試想像，對著非洲的部族宣揚「去增長」將是多麼的不恰當。「過好活」之類的觀念，其實有著更廣濶及更積極的意涵。受著佛教的影響，不丹有快樂的觀念，這甚至被寫進了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目標。這可能只是有如大海般的全球市場裡的小島，但他們針對當代社會的模式，率先發展出一套批判而顯然更全面的觀點。

將使用價值的排序置於交換價值之前，亦意味著重新發現地域的面向。全球化以全球的相互交往令人忘記在地親近性的美好，無視外在成本及奉金融資本為尊，而其虛擬的性格正是經濟領域最為全球化之處。地域空間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地點，亦是政治責任及文化交流的地點，而這正是引入另一類基本原則之處。需要的並不是把問題收縮到一個見微知著的小宇宙，而是從多方位去思考之，由在地單位至全球領域，每一面向均有其功能而無需摧毀他人。從滿足在地領域各方面的需要而言，貿易也需服膺於更高的原則，例如食物主權及能源主權（Jean-Philippe Peemans, 2010）。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價值的法則奉商業化為尊，因而作物的出口被認為需優先於本地食用的食物生產。所謂「食物安全」的概念並不足夠——因為糧食的穩定供應，完全能建基於破壞本土經濟的貿易、建基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過度專門化、建基於貪婪地消耗能源及破壞環境的全球運輸等的貿易。

按這思路，在全球的規模上邁向經濟的地域化，是由資本的中心脫勾的積極進路，阻止全球其他地方（即使是新興國家）被轉化成邊緣地區。從貿易及貨幣系統的角度而言，這也是積極的進路，因為它有助重新設計全球化的模式。

具體的措施極多，這裡只能列舉少部份。反面來說，金融資本強勢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所有類型的避稅港都必需消除，同樣道理，銀行的保密制度亦必需消除——這是主導階級在階級鬥爭中的兩種有力工具。此外，必需訂立「托賓稅（Tobin tax）」，從國際金融流動中徵稅，控制金融資本的力量。經過如厄瓜多爾曾進行的公正核數後，所謂「惡債」也必需廢除。對食物及能源的投機炒賣亦不能容許。如上面文所論，按工業及農業產品的運輸距離徵稅，能減低運輸及濫用「比較優勢」所造成的生態成本。延長工業產品的「壽命」，能減少原材料及能源的消耗，也能限制資本純粹由於貿易而產生的利潤（Wim Dierckxsens, 2011）。

許多正面的案例可以援引，從而說明社會性的經濟可以建基於與資本主義式經濟相當迥異的邏輯。無疑到目前，相比於寡頭壟斷的資本及其無遠弗界的發展，這些案例都只屬於少數，然而也有可能從多方面加以鼓勵。合作社及民眾信貸正是這種例子，必需保護它們免被強勢系統所破壞或吸納。對於區域性的經濟措施，它們意味著遠離經濟邏輯的轉化，但也必需防止舊有制度藉新的生產技術適應新環境——即作為國家經濟與全球資本框架在更高層次的融合的手段。在食水、能源、運輸、通訊、醫療、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還原被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了的公共財貨，亦是關鍵的一步。這當然不意味著一切都收歸國家控制，相反，應設立許多不同形式的公共及市民管理，以處理其生產及分配。

排他的個人主義、漠視維持人類生命條件的集體維度，我們正面臨人類共同遺產被破壞的危險。正是在這情況下，透過重新理解所謂「經濟」，來重新定義人類共善，乃是當務之急。

4.3 重整集體生活：社會關係及制度的普遍民主化

就集體生活的範式及人類共善，我們第三個主題是普及的民主，不單在政治的領域，而是包括經濟系統、不同性別及所有其他制度。換言之，必需捨棄純粹的形式民主——通常它不過確立虛假的平等及暗渡陳倉地延續許多社會不平等。這工作涉及翻新關於國家的觀念，重申包括個人及集體等各方面的人權。這涉及無區別地對待不同種族、性別及階級的所有人類，一視同仁為重建社會的伙伴，確認不同人自身的價值及參與（Franz Hinkelammert, 2005）。

國家的觀念處於在這問題的核心。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中央集權的國家模式，抹平所有差異而建立原則上平等的公民，對於建立真正的民主，並不足夠。從超越歐洲政治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它無疑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然而，現已不能單單考慮對立的階級，以及確認任何一個階級或不同階級之間的聯合，有能力操縱國家並確保其利益；現在需要承認所有不同民族都同樣活於一片土地，同樣有權利堅持其文化，其鄉關及社會制度。並不是要如新自由主義時代一些歐洲國家般，墮進某種將國家能力削弱的社群主義，也並不是要接受新無政府主義某些合理而大規模的抗爭。更不是要如某些政治宗教般退回對浪漫過去的鄉愁，以及如一些經濟利益集團（跨國企業反國際金融機構）般，傾向欺壓小規模的在地團體。我們的目標是要在這些不同維度的集體生活——國際、區域及在地——中達至均衡，充份確認其存在及設立各種參與的機制。

關於國家角色的討論，不能不包括社會最邊緣群體的狀況：上千年以來不斷被漠視的無地農民、低等的種姓及所謂賤民（dalits），以及被忽視了五百年的美洲及非洲原住民，而在他們當中，女性尤其受到雙重的邊緣化。司法程序，甚至憲法程序，即使都絕對必需，但都不足以扭轉局面。種族主義及偏見在任何社會都不會突然消失，在這領域文化因素是一個關鍵，也可成為致力改善的目標。保護人民免受「全球市場」壓迫，以及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社會政策，是過渡期的重要措施，而前提是這些措施並不純粹被視為與制度變革無關的慈善行為。

將語言扭曲至脫離原來意義的情況亦需要被重視。右派是箇中的能手：現在有許多人吹噓所謂「綠色資本主義」。即使對求變的國家來說，「過好活」（Sumak Kawsay）等傳統概念也必需按其真實的意義來分析，方能作為過渡到另一種集體生活的元素，否則就不過是現行系統的改頭換面。現實的政治語境有助理解兩者的差異及評價之。

對政治實體及社會運動之間的對話，民主的普及化也應起作用。成立以諮詢及對話為目標的組織，尊重彼此之間的自主性，也屬同一大方向的一部份。在波利維亞拉美人民陣線（ALBA, Bolivarian Alliance of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基本架構下的計劃——社會運動議會（Council of Social Movements）是這方向上的一個原創性嘗試。關於「民間社會」的概念，

雖然經常在有關的討論裡被提及，但意義仍然是含糊的，因為階級鬥爭仍然會在這場域發生：事實上，存在著由下而上的民間社會，也有由上而下的。不加區別地應用這概念，有機會產生含混及目前一些無視階級差異的社會方案⁶。拉丁美洲一眾國家的經驗展示了許多不同形式的參與式民主，它們都參考同一普及民主的邏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的真正獨立是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保證。另外，一個民主的國家也必需是一個世俗的國家：亦即是權力部門不能受到宗教組織的干預，即使是主流宗教。這其實也是宗教自由的基礎。但這卻不表示國家應該否定宗教的公共面向（例如，解放神學的社會倫理面向），甚至乎，如「實存社會主義」的一些國家般，強行奉無神論為國家宗教。

其他的機構亦應參考這些指導原則。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是最不民主的，決策的權力聚集在幾個人的手上。社會傳播媒體也是同一原理，所有其他工會、文化、體育、宗教及社會組織亦然。

關於「非暴力」的觀念，亦顯然與普及化的民主有關連。人類社會中所有矛盾，包括家庭內及國際層次的矛盾，都必需訴諸形式及非形式的非暴力機制來解決。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關於國家壟斷合法暴力的概念是有危險性的，因它能為例如伊拉克、阿富汗及利比亞等的戰爭提供方便的藉口。然而，雖然非暴力是值得追求的原則，事實上我們卻活在一個充斥著暴力的社會。

暴力的發生，幾乎無例外地都是由於追求經濟及政治的霸權。從現代史來看，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是導致暴力的主導因素，無論是內部資本的累積（例如，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又或者為確保一國能操控另一國，最終控制其天然資源（石油或戰略性金屬）。文化及宗教的論據，經常有意無意間，成為了人民或群眾支持經濟及政治衝突的意識型態的合法性根據。然而，文化及宗教論據也可成為受壓迫群體為公義而抗爭的非物質彈藥。

在這意義下，戰爭無異於獨裁者，代表著民主的失效，及追求人類共善過程的斷裂。軍事科技發展至今，當所有民主手段都被排斥時的人民抗爭，已無所謂公義之戰。然而，抗爭的倫理及政治基礎，需建立在對所有因素的整全社會政治及歷史分析上。

對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的抗爭當可列入這範疇，民主化大眾傳播媒體的行動，禁止金融資本操縱之，也屬同類。非國家組織，例如政黨、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文化及宗教組織等，也可透過確保民主運作（例如男女平等、責任更替等）的規條而獲得公眾認可（甚至經濟支持）。

同一原則應用在國際政治層面，也有許多可能性。聯合國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其眾多部門，從安理會開始，便全然不民主；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尤其是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亦在此列。在這方向上的建設性工作，應將邊緣群體的治理放於首位。雖然並非正式組織，但G8工業國集團及G20國集團卻有實質的力量，必需被挑戰。捍衛人權的法庭雖然值得追求，但都需要受制於同樣的民主規格，以及處理更多不同領域事宜，例如經濟罪行、「惡賬」及生態破壞等。所有拉丁美洲的機構，例如南方銀行（Banco del Sur）、區域性貨幣（the Sucre）及波利維亞拉美人民陣線等，與其他洲的區域性機構，都在這意義下應被慎重對待。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破壞（特別在新自由主義的階段），所挑起的不平等，程度之高乃歷史上前所未見。嚴重得令到許多社會在不同層面都組織起來，捍衛小眾社群的利益。重新建立民主運作的普世範式，亦因而成了人類共善的核心支柱。

4.4 確立相互文化主義，共建普世共善

⁶幾年前，在波哥大（Bogotá）一個人口眾多的社區，曾有一句標語寫在牆上：「我們也有人權！」

文化維度的目標，是給予平等機會讓所有形式的知識、文化、哲學及宗教能共同建設人類共善。這角色不應由西方文化獨佔，因它實質上等同於所謂「發展」的觀念，消滅或邊緣化其他所有視角。執行上，不單要求對現實的理解及期盼，更包括闡釋人類共善所必需的倫理，包括自我激發為行動者的情感維度、美學及實踐上的表達形式。多元文化主義當然包含採納其他三大主題的組織原則：與大自然的關係、生命基本所需的生產、及廣義的民主組織。同樣重要的是意念及價值觀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傳遞。以平常人的語言來說話，以為人所理解的語彙表達自己，都是民主的基本要求。

然而，多元文化主義卻是不充份的。公開的相互文化主義亦都應被提倡，以強調文化間對話及交流的機會。文化並不是博物館的收藏，而是社會上有生命的元素。內部及國際間的移民，關係到傳播工具的發展，導至大規模的文化轉變。顯然不是所有都值得追求，但都有機會導至豐足。文化的生存需要物質基礎及手段，包括不同形式的鄉關、教育及傳播媒體，亦包括各種文化表達的機會，例如節日、朝聖、儀式、宗教團體及建築等。

接著就是設計多元文化國家的框架的具體操作。例如波利維亞及厄瓜多爾等國家，透過成立多元民族的國家，將概念翻譯到憲法裡，雖然在實際操作上不無困難。核心理念是國家有責任保證不同民族的基本文化活動，尤其是保護他們免受經濟現代性及強勢文化的攻擊。為達至這目的，雙語教育是重要的工具。此外，相互文化主義的觀念亦應影響通識教育，例如教授歷史及重構目前被市場邏輯主導的教育哲學。出版廉宜的書籍、舉辦書展、工匠中心及互動博物館等都是實用的方式。除了傳遞資訊外，傳播媒體的重要性亦在於傳遞價值觀，前題是不違反多元主義及民主的原則。促進不同的在地文化、抗衡壟斷及摧毀少數幾個國際機構的支配等，這些問題必需視為一個整體來處理。處理倫理問題的團體，例如捍衛人權的組織、不同類型的監察機構、宗教組織等，都必需有表達的機會。

文化包括靈性的維度，這是人類的特質——將人類從日常生活中提升。當文明正面臨災難時，這更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放眼整個世界，到處都在尋找意義，重新定義生命的目的。靈性乃是超越物質世界及賦予意義的力量。靈性有許多來源，也必然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缺乏物質及生物基礎，靈性無以存在。人類是不可分割的：靈性的假設是，沒有精神就不會有意義。某種靈性的文化觀點無視人類的物質面向——對個體而言是身體，對社會而言就是經濟及政治現實——這無疑是個概念的歪途，有簡化（文化是變革的單一因素）及異化（對社會結構無知）之嫌。無論有沒超自然力量作為參考，靈性皆為地球上的人類提供意義。這意義將被如何表達，取決於個別社會的社會關係，但它亦能為這些關係給出指引。靈性有許多軌跡及不同的表達，但範式的轉變不能缺少靈性。

對世界的願景、對現實的理解及分析、社會及政治建設的倫理、美學表達及行動者的自我激發等，都是替代資本主義及其文明觀的方案所必需的核心元素。它們是新範式所有維度的一部份：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生命基本需要的生產、重新定義經濟，和歸根究底我們如何理解社會的政治及集體組織。儘管有所差異，這些文化元素能為促成人類及地球存續所必需的改變作出貢獻。

5. 作為全球目標的人類共善

人類共善，換言之，就是達到這四個目標後的情況，而每個目標都對人類在地球上的集體生活有著根本的重要性。透過政治力量保證及由主流文化所傳遞，資本主義所定義的目標並不可持

續，也無法確保人類共善。相反，它有違生命的存續 (François Houtart, 2009)。現存的範式必需改變，讓人類及大自然形成共生的關係，能取用各種物品及服務，讓所有個體及團體能參與社會及政治的組織過程，讓每人都有其文化及倫理表達：亦即實現人類共善。一般而言，這會是漫長、辯證而非線性的過程，也是眾多社會抗爭的結果。本文語境裡，這概念的意涵遠超古典希臘哲學，及後來被文藝復興所承繼的「共善」概念 (J. Sanchez Parga, 2005, 378-386)，亦超越天主教會建基於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哲學的社會學說。

正因如此，完整的理論反省實屬必需。一方面需要處理所有導至世界邁向系統性災難的因素，也要處理崩壞中的歷史模型；另一方面，重新定義新社會型構的目標，這社會型構尊重大自然，並有能力將確保人類生命定為共負的責任。如埃里克·都索 (Enrique Dussel, 2006) 指出，需要確保的是每個倫理主體 (即每個人) 的生命的生產、再生產及發展。這正點出了人類共善的意涵。人類發展的任何範式的終極參考都是具體現實中的生命，包括與大自然的關係——而這正是資本主義邏輯所否定的。

或有人會批評這過於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事實卻是，人類需要烏托邦，而資本主義卻摧毀了人對理想的思考，宣稱歷史已經終結 (所謂「沒有其他替代」)。故此，尋找人類共善無疑是烏托邦，其烏托邦在於目標並不已經出現，卻可能出現在明天。所有宣稱體現了烏托邦的政治及宗教統治最終都走向大災難，但烏托邦卻是對邁進的呼籲。⁷正是由於此，這並非簡單「無殺傷力的烏托邦」 (Evelyn Pieiler, 2011, 27)。數以十萬計的社會運動、市民組織、政治團體等都體現了對烏托邦的渴望，他們以各種方式為與大自然更好的關係、為保護大自然、為農民及有機農業、為社會經濟、為消滅不當的債務、為集體奪回生產工具，為工作先於資本、為捍衛人權、為參與式民主及為讓不同文化的價值被確認而艱苦奮鬥。世界社會論壇讓這現實明晰地出現在眼前，新的全球社會意識逐步形成。

然而，過程將會是動態的，需要協調而連貫的全局視野作為基礎，以建立足夠強大的力量為目標，在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各維度逆轉當前的強勢系統，讓人在行動中聚合起來。這正是「人類共善」希望表達的：貫徹的理論基礎，讓任何運動及任何社會及政治計劃都在整體中找到位置。達成目標不能單靠幾個為人著想的知識份子的努力，而需要集體行動：借鏡前人的想法，尤其是被資本主義大肆攻擊的那部份社會主義傳統，再結合新的元素。而它的擴散亦不能依賴個別社會團體或者包辦真理的先鋒黨，而是許多反系統的力量，為人類共善而鬥爭。當然，還有許多理論及策略問題需繼續研究、討論及實驗。

過渡

本文無法仔細處理另一觀念，但在此省察的環節還是值得簡介一下：過渡。馬克思在討論歐洲由封建主義生產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移時，恰如其份地發展了這概念。這是「社會的一個特定階段，社會再生產封建主義賴以建立的經濟及社會制度，面對越來越大的困難，而需要在另一種制度的基礎上重整自身，而這就成為新的存在條件的一般形式」 (Maurice Godelier, 1982, 1, 165)。證據顯示，這涉及漫長而非線性的過程，暴力的程度則按參與抗爭的社會團體而定。許多分析指出資本主義已走到其歷史角色的終點，因一如馬克思的觀察，它已成為一個破壞自身存在基礎——大自然和工作——的系統。正是這原因，薩米爾·阿敏 (Samir Amin) 論到「癡呆資本主義」；而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才於金融危機其間，發表文章宣稱我們正在目擊「資本主義的終結」；米沙羅斯 (István Mészáros) 則指出其無能力確保「人類社會新陳代謝」的持續 (I. Mészáros, 2008, 84)。

⁷關於烏托邦，愛德華度，加里安奴寫到：「我向前走兩步，它卻移開兩步。我向前走十步，但水平線又後退十步。我永遠都可向前走，但我也永遠無法達到。烏托邦有甚麼作用？正是：為了向前邁進」 (引自 Maurice Lemonine, 2010)

當我們能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正發生往其他模式的過渡，而氣候危機能加速這一過程，我們也不能忘記改變乃是社會過程的結果，若沒有社會抗爭及權力關係的轉化，這社會過程將不能完成。換言之，資本主義不會自行垮台，所有社會及政治抗爭的聚合是垮台的前奏。歷史教導我們資本主義有能力將其自身的矛盾，轉化為積累過程的助力。在眼前的系統災難的歷史脈絡中，發展關於過渡這概念的理論，將有助我們生產出工具來評估眼下的社會及政治經驗。在不少政權已投入變革過程的拉丁美洲尤其如此，預示著廿一世紀社會主義的來臨。

這概念亦也應用到一般演化中的特定過程。考慮到物質發展的具體處境，以及在社會經濟及政治領域的實存權力關係，這關乎到在不失目標的激進性的前提下，如何辨別能達到理想結果（即另一種人類發展模式）的行動。以開採為本的經濟系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它們產生巨大的生態及社會破壞，而工業本身亦很大程度受到資本的利益所支配，但進步國家卻不能突然剎停這些經濟部門。如委內瑞拉及波利維亞等國家的情況所示，原因在（但不限）於這些工業為新政策提供了經濟支撐。轉型的階段將包括 1) 基於內部市場的需求，引入中長期經濟政策；2) 執行更嚴格的生態及社會法律，制衡經濟部門帶來的破壞；3) 各種成本由用者自負；4) 推動國際間的立法，防止所謂「比較優勢」的現象，即有利立法較不嚴格的國家。在如厄瓜多爾等較少參與到開採型經濟的國家，可透過提出為期數月或數年的延期償付，與不同的社會運動商議出過渡的計劃。

援引這概念工具，需要防止讓它成為向社會民主式的政治及意識型態讓步的藉口——即接受發展生產力不能不採用資本主義的原則、工具及程式。正如在巴西的情況，即使其他領域都取得相當的進步，但這意味著強化最反對變革的階級力量。又或者，在如中國及越南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創造出將無可避免延長過渡期的新社會差異。這便觸及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何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發展生產力？亦即是如何從人類共善的角度發展生產力？需要先發展甚麼力量？正是這個問題，便難倒了不少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二次大戰後的一眾進步政權；而這問題也是這些國家失敗的根源，亦解釋了大多數這些國家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定位。誠如哥德里亞（Maurice Godelier）在他於天主教魯文大學授課時所說：「社會主義的戲劇性在於它以資本主義的腿學走路」。如 2010 年在北京人民大學一次亞洲研討會中所提出，發展有機農民農業而不是推廣出口導向農業的單一種植；又例如重組拉丁美洲的鐵路網絡，而不是採納「南美洲區域基礎建設整合倡議」（IIRSA, Initiativ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of South America）。這些都是可建議的例子，其實尚有許多可以提出來推動真正的過渡，而不僅流於對現行制度的適應。

6. 邁向關於人類共善的普世宣言

人類共善概念的另一任務將會是在聯合國的框架內預備一份普世宣言。當然，一份簡單的宣言並不能改變世界，但卻能在一個不斷生長的計劃下組織起推動變革的各種力量。它也能作為有效的教育工具，傳播動員社會運動所必需的理論工作。它將與國際人權宣言同級——一項早在啟蒙時期及「現代性」早期便開始的漫長文化及政治過程的結果，標誌著個人的解放及人權的確認。這份於十七世紀末由法國及美國發展出來的宣言，我們知道它並不完美，尤其它起草的背景有著濃厚的西方中產階級社會願景。西方勢力亦以之來建立它在全世界的霸權。它亦引來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以非洲人權憲章（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Rights）作回應，以及阿拉伯世界的類似回應。然而，它存在；它亦拯救了許多人的自由及性命，以及導引出許多為人類福祉有用的決定。它亦不斷的改良，增加了第二及第三代的權利。雖然如此，要對應地球及人類眼前所面對的問題，需要新的均衡；不單需要將人權的觀念擴闊，也需要根據新範式重新定義人類共善。

籌備新的宣言，將能成為社會及政治動員的媒界，創造新的意識及作為在國際層面匯聚社會及政治運動的基礎。這當然會是長期的工作，但啟動之已刻不容緩。不僅匯聚不同社會運動的世界社會論壇及匯聚不同政黨的聖保羅論壇，能夠為推廣宣言作出貢獻；個別國家也能夠透過他們在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及聯合國的代表推廣宣言。這將會是一場政治鬥爭，但卻是有價值的：必需透過革命重新定義人類在地球集體生活的新範式，而宣言則可視為革命的符號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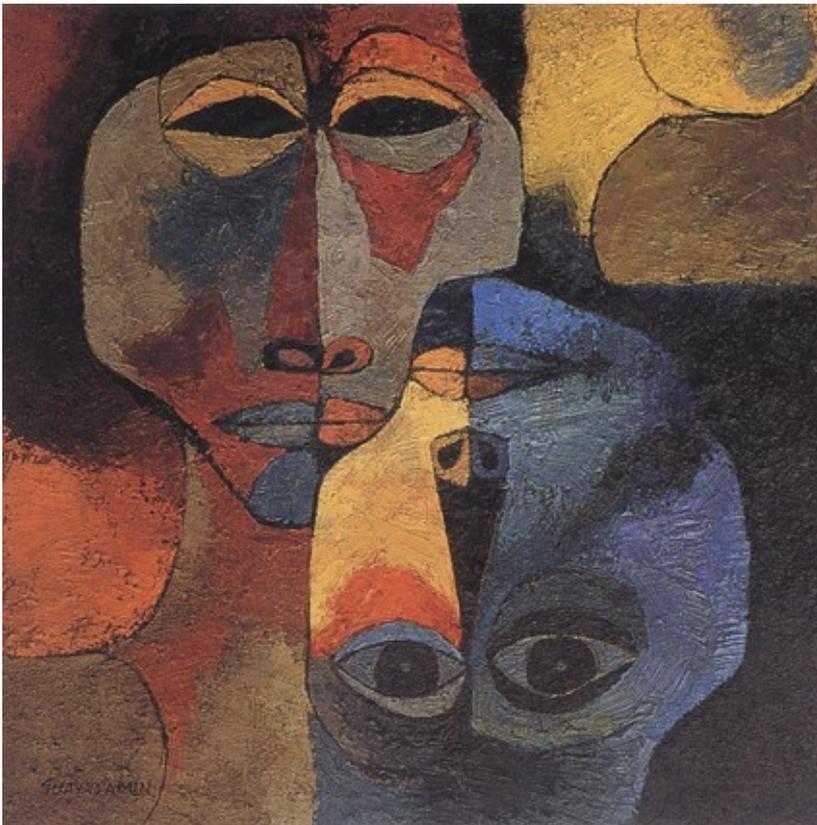
將捍衛例如食水的「公共財產」(common goods)，與重建「共同利益」(common good) 的優先性，以及建構新的「人類共善」(common good of humanity) 的野心三者連結起來，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人類共善的概念中體現的全局視野，需要如公共財產般的具體執行——如果它由抽象中誕生並需要翻譯為行動的話。另一方面，特定的鬥爭，為了辨別其扮演的角色，必需在全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不是緩和系統失靈之處（及因而延長其壽命），而是為深遠的轉化作出貢獻——這將需要謀求變革的力量聚集一起，從而建立人類及地球存續的基礎。

7. 參考書目

- ACOSTA A. / MARTINEZ E (2009), *El Buen Vivir – Una vía para el desarrollo*, AbyaYala, Quito
- ALBO X. (2010) "Suma Qamaña, Convivir Bien. ¿Cómo medirlo? Diálogos, Year 1, No. 0 (August 2010), 54-64.
- AMIN S. (2003) *Le capitalisme et la nouvelle question agraire*, Forum du Tiers Monde, Dakar
- BEINSTEIN J. (2009), *El Largo Crepúsculo del Capitalismo*, Buenos Aires, Cartago, 2009.
- BOFF L. (2002) *El despertar del Águila*, Trotta, Madrid
- BRAUDEL F. (1969), *E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69.
- BRIE M. (2011) *Making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concrete*,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CARCANHOLO R.A. and SABADINI M. de S., "Capital ficticio y ganancias ficticias", in DIERCKXSENS W. et al., 2009.
- DELGADO G. (2011) *Metabolismo social y Futuro común de la Humanidad: Un análisis Norte-Sur*,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DE SCHUTTER O., *Eco-farming can double food production*, Geneva,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8 March 2011).
- DE SOUZA SANTOS B., *Refundación del Estado en América Latina – perspectivas desde una epistemología del Sur*, Quito, Abya Yala, 2010.
- DIERCKXSENS W. et AL., *La gran crisis del siglo XXI – Causas, Carácter, Perspectivas*, San José, DEI, 2009.
- DIERCKXSENS W. et al., *Siglo XXI, Crisis de una Civilización*, San José, DEI, 2010.
- DIERCKXSENS W., *Población, Fuerza de Trabajo y Rebelión en el Siglo XXI*, text prepared for 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t Dakar, www.Forumalternatives.org (2011).
- DUSSEL E. (2002) *Philosophie de la Libération*, L'Harmattan, Paris
- ECHEVERRIA B. (2001) *Las Ilusiones de la Modernidad*, Quito, Trama social, 2001.

- FORNET-BETANCOURT R. (2011), *La Philosophie interculturelle*, L'Harmattan, Paris
- GEORGE S. (1999), *The Lugano Report*,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 GODELIER M. (1982), "Transition",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UF, 1982.
- GUDYNAS E., *El mandato ecológico – derechos de la Naturaleza y políticas ambientales en la nueva Constitución*, Quito, Abya Yala, 2009.
- HERRERA R. (2008), *Un autre Capitalisme est possible*, Paris, Syllepse
- HERRERA R. (2011),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et ses Effets*,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HERRERA R. / NAKATANI P (2009), "Las Crisis financieras, Raíces, Razones, Perspectivas" in DIERCKXSENS et al., 2009
- HINKELAMMERT F. (2005), *El Sujeto y la Ley. El Retorno del Sujeto*, Caracas, Ministerio de Cultura
- HOUTART F. (2009) *El camino a la Utopía desde un Mundo de Incertidumbre*, Panama, Ruth Casa Editorial, Havana, Instituto cubano de Investigación cultural, Juan Marinello
- HOUTART F. (2010), *Agrofuels: Big Profits, Ruined Live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Pluto Press, London
- KOVEL J. (2007), *The Enemy of Nature –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 LATOUCHE S. (2010). *Sortir de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Actes Sud
- LEMOINE M. (2011), "A quoi sert l'Utopi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 MAFFESOLI M. (1988) *Le Temps des Tribus*,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k
- MERCIER-JESA S. (2008) 'Besoin' in Bensussan G and Labica G. (1982),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UF, 96-100.
- MESZAROS I. (2008) *El Desafío y la Carga del Tiempo histórico –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Buenos Aires CLACSO, Caracas, Vadell
- MOLINA MOLINA E. (2010) *Vigencia de la teoría general de Keynes*, Hav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 NUNEZ O. (2011), *La Economía social solidaria en las Naciones proletarizadas y el Proletariado por Cuenta propia en la Transformación del Sistema*, Managua
- ORTEGA J.(1995) "Identidad y Posmodernidad en América Latina", *Socialismo y Participación*, No. 70
- PETRELLA R. (1988) *Le Bien común – Eloge de la Solidarité*, Labor, Brussels
- PIEILLER E. (2011), "Dans la caverne de Alain Badiou",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 PLEYERS G. (2010) *Alterglobalization – Becoming Actors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The Polity Press
- QUIROGA D. (2009) "*Sumak kawsai*, Hacia un nuevo pacto en armonía con la Naturaleza", en ACOSTA A. et al.
- RUIZ DE ELVIRA M. (2010) "El gran hermano de los Barcos", *El País*, 15 December
- SALAMANCA SERRANO A. (2011), *Teoría Socialista del Derecho*, Quito, Ed. Jurídica del Ecuador (2 vols.).

- SANCHEZ PARGA J. (2005). *Poder y Política en Maquiavelo*, Homo Sapiens/CAAP, Quito
- SOUTH CENTER (2008) *Food Autosufficiency, Energy Crisis*, Geneva
- STERN N. (2006), *Report on the Economy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The Treasury
- STERNKELL. Z. (2010) "Anti-Lumières de tous les pays",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 STIGLITZ J. (2010) *The Stiglitz Report*, The New Press, new York, London
- VANDEPITTE M. (2011) *Redirecting Production for Life's Necessities, Prioritizing Use Value over Exchange Value*,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WALLERSTEIN I. (2000)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 A Long 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15 (2), 251-267. June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

布魯塞爾辦公室

Avenue Michel-Ange 11

1000 Brussels

Belgium

電話：+32 (0)2738 7660

傳真：+32 (0)2738 7669

電郵：info@rosalux-europa.info

網頁：www.rosalux-europa.info